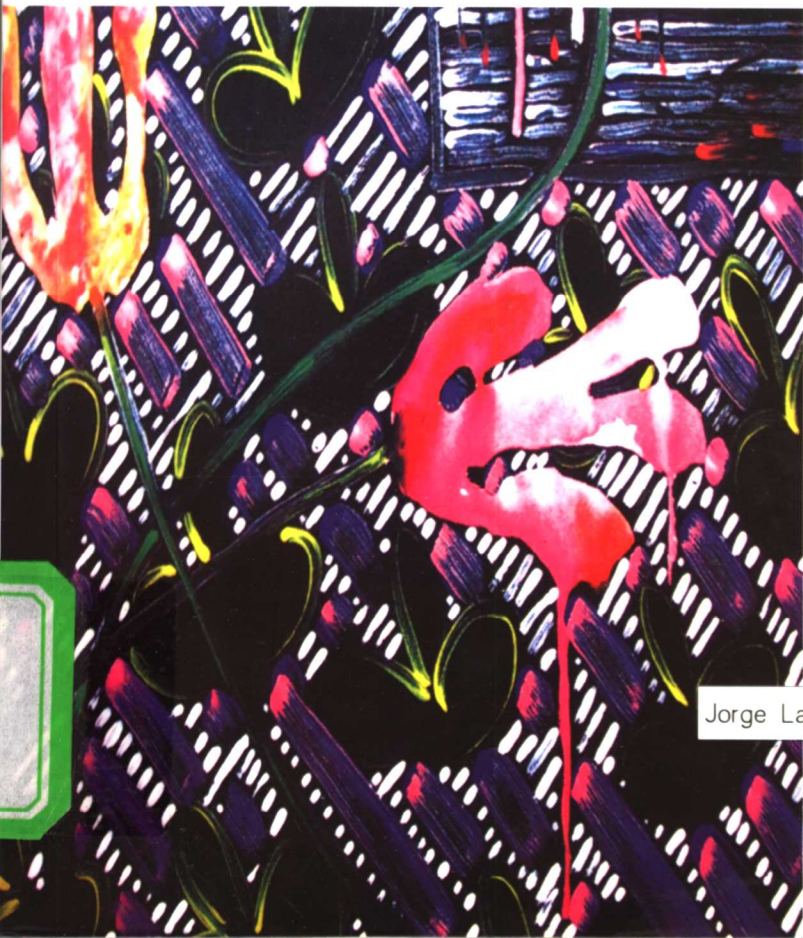


都市
与文化
译丛

意识形态 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

上海教育出版社



Jorge Larraín 著 戴从容 译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Jorge Larraín 著 戴从容 译

Copyright © Jorge Larraín 1994

The right of Jorge Larraín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published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
(英) 拉雷恩 (Larraín, J.) 著；戴从容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
ISBN 7-5320-8783-2

I. 意... II. ①拉... ②戴... III. 意识形态—研究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00638号

都市与文化译丛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乔治·拉伦著 戴从容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66,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本

ISBN 7-5320-8783-2/B·7 定价: 15.00元

都市与文化 译丛

1. 都市与文化 译丛

Urban Studies

译丛总序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

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被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场所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就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의 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義，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物体系》)

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

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

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

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将主要发表关注以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2004年3月

前言与鸣谢

本书通过对近阶段的思想家和学术思潮的分析，特别通过突出非理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或意识形态批评，补充完善了《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些早期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不过，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在全球这一更广阔背景下讨论这些观点：一是将第三世界的存在考虑在内，其次深入到文化身份的问题。我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受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学术氛围、教学及讨论的影响。在有关文化身份的问题上，理查德·约翰逊对我的研究的影响尤其重要。他本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与本书的一切缺陷毫无关系。我也想感谢托尼·吉登，不仅因为作为编者，他的一些建议使本书大为改观，而且也因为他的一些观点极大支持了我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看法。我非常感谢政体出版社和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许多人，他们在我出国期间，高效率地完成了本书的出版工作。这里尤其应该感谢林丹·斯塔福德出色的文字编辑，是他使文本得到极大的完善。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对我的英语中仍有的不恰当之处负责。

本书作者和出版人感谢下列材料的作者同意本书使用他们已经出版的论著：

《意识形态及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修正》，见诺尔·欧苏利文编，《现代意识形态结构》，阿尔德肖：爱德华·埃尔戈印书局，1989年；

《后现代意识形态批评》，《社会学评论》，第42卷，第2期，

1994年5月;

《古典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落后”民族》,《世界发展》,第19卷,第2~3期,1991年2~3月,第225~243页,蒙英国派加蒙出版有限公司批准引用;

《斯图亚特·霍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理论、文化与社会》,第8卷,第4期,1991年11月,第1~28页。

目 录

绪论	001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理性与他者的构建

引言	007
意识形态与理性	011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	012
意识形态、全球化及其他形式的压迫	015
理性与减少差异	022
理性与种族主义	029
历史主义与忽略一致性	034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对理性的攻击

引言	043
意志至上：叔本华	044
权力意志：尼采	050
遗留物和衍生物：帕累托	066
工具理性的问题：“批判理论”	073

第三章 结构主义与阿尔都塞学派的解体

引言	080
路易·阿尔都塞的自相矛盾	081
阿尔都塞学派的分裂与解体	090
阿尔都塞学派中的正统派	094
起表述作用的政治与起质问作用的意识形态	100
阿尔都塞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116
意识形态、符号学和精神分析	117

第四章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引言	123
福柯与意识形态	124
意识形态与认识论的终结	132
政治与话语逻辑	135
后现代主义	142
从意识形态到极权主义元叙述：利奥塔	144
从意识形态到超现实：波德里亚尔	147
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批评	152

第五章 哈贝马斯与新理性观

引言	164
意识形态观	167
几点批评	172

意识形态的终结?	177
朝向新的理性观和理性化	180
交往理性、认同和真理	185
种族中心主义、相对论和文化身份	189

第六章 文化身份、全球化与历史

引言	193
现代性与个人身份	195
全球化与时空浓缩	206
全球化与民族身份	210
文化身份与本质论	215
文化身份、历史和差异	220
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226
参考论文中英文对照表	229
参考书目中英文对照表	232

绪论

本书包含几个意图,涉及不同的层面。概括地说,本书力图探讨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即意识形态、理性和文化身份,这是当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讨论中的核心问题。本书努力使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思想,而且也与第三世界的现实展开对话,尤其与拉丁美洲的现实进行对话。本书也希望对从叔本华到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并作出批判性的分析,这些理论或者贯穿于或者来自反现代性思潮。与此同时,本书也将界定并使用一种源于马克思、但并不与其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观,以便对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普适性理论的缺陷作出评价。此外,本书希望更详细地探讨与文化身份观有关的若干问题,以及文化身份与个人身份和全球化进程的联系。最后,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讨欧洲人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拉丁美洲的一些看法,以便在普适理论与历史主义理论之间,在普适理论与构建他者的特殊方式之间建立起某些联系。对普适理论与历史决定论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理性与种族主义之间的不同关系。

在第一章中,我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工具理性的胜利而出现的。因此,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理论是由那些相信理性和进步的重要的发展理论或隐或显地建立起来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韦伯的现代化理论。理性与意识形态在现代性形成阶段的亲缘关系直接影响着“他者”的构建和对待其他文化的方式。典型的现代性理论倾向于具有普适性,漠视差异,把特殊简